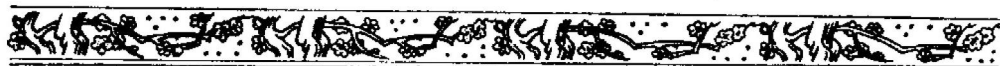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忆伯韬同志

刘季平

戴伯韬同志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好好学习的一位好同志。

我们从一九二八年起就开始相识，其后也曾有几段不太长的时间，同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工作过。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汉合作共事的一小段；以及从一九七二年春由于校回北京到他不幸去世以前的几年。前一小段因朝夕相处，了解较为具体；后来的几年，虽只偶然见过几次面，却每次都使我愈加深刻地感到他的思想品质之高尚可贵。这两段当然不能完全说明他的一生，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又只有很少几点情况，可是仍可以从中看出他忠心耿耿、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数十年如一日的一个大概。所以我在这里就只着重回忆这两段时间中的若干印象。

—

一九三七年九月，党由于考虑到上海可能成为敌后孤岛，需要及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宣传文化阵地。为此，除建立进步书店外，还决定从上海动员几个进步刊物转移到武汉去

编辑出版。其中第一批刊物之一，就是原由戴伯韬同志主编的、在“八一三”后改名为《战时教育》的《生活教育》杂志。他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成员，在国难教育社以及其它好些抗日救国活动中已经同我们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党决定要我去和他共同负责这一工作。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共事。时间虽然不长，却从一开始起就使我认识到了，他在实际上早已就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党外布尔塞维克。所以到那年年底前后就很快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刊物转移问题，是由国难教育社党内负责人王洞若同志和我一同找伯韬同志商谈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示了同意，只要求仔细讨论一下此后的工作方针。于是紧接着就以国难教育社和《生活教育》杂志编辑部名义召开了一次有杨东莼、王洞若、戴伯韬和我等少数党内外同志参加的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当时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宣传口号，和刊物转移到武汉后的活动方针。伯韬同志首先反映了那时教育方面的两种主要危险思想：一是国民党顽固派的“读书救国论”，一是在少数人中流传的“停办学校、共赴国难”之类的思潮。大家经过反复商讨后，一致建议提出“抗战教育”作为当时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口号。并且注意在国民党地区各级学校中宣传“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用以冲破“读书救国论”下的旧秩序，防止某些过左倾向，又动员部分抗日师生采取这个方式联系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现在回头看，这些提法在当时还比较合适，而这和伯韬同志对客观情况的具体分析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由于这个刊物从九月间开始在上海和武汉相继出版了几期，根据这个方针进行了宣传，所以我们在那年十月上旬到达武汉后，马上就引起武汉教育界许多人的注意，不少大学师生和中小学教师都纷纷来找我们谈话，约请我们参加他们的集会。而且不到一个月，就很快在十月下旬开始发起成立抗战教育研究会，进而在许多方面展开了日益活跃的各项活动。

我们在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十分紧张和繁重的；在我们很少几

个人中，负担最重的又首推伯韬同志。在尚未离开上海以前，为了使刊物不致因迁移而脱节，既要抓紧编好几期留在上海印刷发行，又要为转到武汉后立即继续编辑出版作好各种准备。在转移过程中，为了了解各地教育界的动态，争取各地教育界的支持，扩大对抗战教育的宣传，既要尽可能写信加强与各地友人的联系，又顺便在南京、当涂、芜湖、安庆等地停留了几天，亲自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到达武汉后更是越来越忙，既要抓紧写作、编校，克服经济困难，安排日常生活，又要络绎不绝地接待来访、答复来信，还要常常走出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可是伯韬同志不管如何忙乱，总是力求分清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不管怎样疲劳，都主动积极地找最麻烦的工作做。而且对各项工作，只要商量定了，总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克服一切困难，贯彻执行。他待人接物又十分恳切耐心，心平气和，令人一见如故，大家有事总愿意找他谈，他遇事也总要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共同商量着办。因此，他在那时就成为我们里里外外都少不了的第一忙人，成为我们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日常工作主管人。我们那次到武汉，之所以能很快打开局面，做出若干成绩，主要的当然是由于当时整个形势较好，我们党的领导正确，同时和当地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也分不开；但是，就我们本身来讲，则不能不承认，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还是得力于伯韬同志那种孜孜不倦、勇于挑重担的负责精神。而这一点又不仅是出于一时激情，事实证明，他在那以后的所有岗位上，始终都是这样对待党的工作的，都是这样辛辛苦苦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不仅如此，他在那年年底入党以前，不但非常尊重我们党的领导，还密切配合和协助我们党做了好些有益的工作。

例如，我们为了及早准备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就建议在武汉大学等校举办游击训练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同意我们这样办，并且指派聂鹤亭、边章五两同志来进

行具体指导。对此，伯韬同志就马上同意派刘明凡同志协同聂、边二同志，以抗战教育研究会名义到武大等校去筹办起来。这些训练班不单使抗战教育活动变得更加切实有力了，而且由此吸收培养了不少党的干部。

再如，我们党在一九三七年冬成立了一个武汉纺织工人工作委员会，需要有个公开的名义作掩护，以便于尽量争取公开活动。由于抗战教育研究会的群众基础较好，已经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就派这个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人张敬仁同志来同我们商量；对此，伯韬同志也立即同意把这个党的工作机关放在抗战教育研究会里面，以抗战教育研究会工人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在武汉三镇及其它一些地方，公开筹办工人俱乐部及工人夜校等机构，广泛展开工人工作。而且除多方设法在武昌租用一所较大房屋，以适应两个单位工作人员大增多的需要外，他还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了这个复杂问题。一方面出面协助我们进行必要的社会联系，和我们共同承担公开责任；一方面又帮助我们对外对下保守秘密。当时为了严格保密，甚至对好些分配到这个委员会来工作的党员同志也没有讲清楚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所以有的同志直到六十年代文化革命期间还不知道那是隐蔽在抗战教育研究会内的一个党的工作机关。

我为什么要首先回忆伯韬同志这一段历史呢？因为这是他一生中由党外布尔塞维克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不是偶然发生、轻易决定的。在我们到武汉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董必武同志曾亲来我们住处，十分平易近人地给了我们一些鼓励和指示。董老离开后，我们漫谈了一阵董老的历史和为人，伯韬同志就很恳切地说：“看过去的中国，想将来的前途，只有走董必武走过来的这条路，像董必武这样做人，这样工作，才能救中国。”（大意）现在回想这一席谈话，联系他在当时和后来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品德及工作作风来看，他正是这样做人、做工作的，所以不单令人难忘，也特别值得深思。

二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中央科教组仍控制在“四人帮”骨干分子迟群等人的魔掌中，对原中央教育部的绝大部分人员机构，全都采取任意乱砍的取消主义方针。对主管各级学校教材工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决定撤消机构，分散人员，下放印刷厂，甚至连所存图书档案也要全部处理掉。我和刘仰峤同志向当时教育部“五七”干校军管小组一再提出意见，请求，据理力争，均未能解决问题。幸亏伯韬同志直接写信给周总理，经周总理亲自过问，才迫使迟群等人不得不勉强留下了一小部分干部，并同意让伯韬同志回到北京来“负责”这个工作。

可是迟群等人在表面上要他“负责”，实际上还是迟迟不肯正式恢复他的工作，反而继续折磨他，给他小鞋穿。过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精挑细选来的，经过长期考验锻炼的大部分干部，都已分散到各地改做其它工作，迟群就用编制名额卡住他们，不让抽调回来；过去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的老基础已被搅得零乱不堪，工作困难重重，迟群就或推或拖，或者置之不理，一直不给解决。伯韬同志过去早已积劳成疾，后又受到长期迫害，心脏病相当严重，迟群等人更不闻不问，从未想办法帮他解决医药问题上的严重困难。

对于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伯韬同志在内心里是相当苦恼的，有时碰到像我这样的老朋友，偶然也会情不自禁地诉诉苦。他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就曾诉说：“……组织未正式建立，人员太少，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光是人事关系就把我缠死了。……现在可有谁了解我的苦哀呢！”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放松斗志。相反，倒更加挺起胸膛，咬紧牙关，排除万难，带病拚命，挑起了那付担子。不仅亲自督同留下来的少数同志，重新整建编辑队伍，恢复正常工作，还亲自参加审稿工作，亲自帮助解决人事上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麻烦问题。据去过他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他那张桌子上堆

满了等待审阅的课本和等待处理的信函文件，只剩下眼面前一小块桌面可以看看和写写东西。他的身体很不好，形容很憔悴，常发心绞痛，还常有些同志要来找他解决各种大小问题。我在那时对迟群的反动实质还认识不清，对他处理好多类似问题的恶劣态度已十分愤慨；对伯韬同志的困难处境很同情，而对他忍辱负重的精神又很钦敬。就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看到他那封来信的当晚，匆匆写了一首《赠戴邦》的打油诗去劝他：

听说你的桌子上，
一堆堆，一垛垛，
围成了一堵墙，
还有不少人要找上门来，
弄得你难阻，难躲，难藏。
大家都说你的精神可敬，
我看你的方法还值得商量。

你本来姓戴名邦，
这里倒可能做点文章。
戴邦，戴邦，
原可有两种叫法，
或是“代办”，或是“带帮”。
我建议你，
更多发挥中青年的力量，
不当“代办”当“带帮”。
办法是下定决心，
把日程砍去一半，
把桌上的墙断然推开，全部下放。

也不是贪懒不干，
而是放开手脚，
让中青年挑担子，
抬起头来一带二帮，
必要时指指方向。

一句话，照毛主席的话办，
抓方针，

抓政策，
抓思想，

以点带面，
纲举目张。

我在这里要他不要当“代办”，其实是不太确切的，他对下面的同志一向都很尊重，并没有代替包办的现象，我那样讲只是故意极而言之，劝他尽量少管一点具体工作，没有想到这在他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他看了我的打油诗以后，只苦笑了一下，一直没有正面表示可否。相反，在其后几次见面时，总是再三向我宣传锻炼身体的好处。说他每天拂晓都要出去爬一次景山，然后再回来洗脸，吃早饭，上班工作。说只要这样办了，这一天的精神就好得多。锻炼当然是好事，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还有他的复杂心情。第一，他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已经很不好，住处又很简陋，需要靠这个办法走出去吸收点新鲜空气，以拚命维持一天的辛勤劳动；第二，他就医看病的困难一直未能得到解决，除在必要时找本单位自学中医的袁微子同志就近诊治，并自行设法买药外，只有多寄希望于经常不断的自我锻炼。

不过，这尽管也会暂时见到一些效果，他的心脏病仍因工作负担过重又无法好好治疗而日益严重，心绞痛仍时常发作，并有几次发得很重，幸亏广安门医院陈鼎祺医师，在了解到他的困难情况后，觉得很有必要给予特别照顾，就经常主动利用业余时间，亲自上门来给他看病，病情严重时还随时赶来抢救。这才使他得以带病坚持工作好几年。

“四人帮”被粉碎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受到了较大重视，陆续增加了一批专业人员，很快修建了一些新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他们在工作上也比较快地作出了显著成绩。但我仍一再听到一些反映，说他们那里仍然只有一个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临时班子，勉力应付着一切，他的负担还是很重。

在他突然去世前不久，我听说他又大发过一次心绞痛，就赶

去看望他。据说病已抢救过来，教育部也已同意让他退居二线，可是他却依然维持着每天清晨出去锻炼一次再回来坚持工作的老习惯。我看他身体还很虚弱，他们那个大院虽已大大变样，新建了几栋大楼，他依然住在西北角上几间破旧宿舍里，不单卫生条件很差，而且亟须修理，进出道路又尚未平整好，就劝他找个地方，争取出去疗养一下。他说：“不行，这里的事情还很多，我既被指定为‘主要负责人’，只能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新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以后，才能放下这个担子”。

后来听说，他直到去世以前几天，工作还一直很紧张，头一天上午到教育部参加会议，下午在社里开会，晚间又有人来谈到十点多钟才休息，当天早晨五点多钟就起床出去锻炼。谁也想不到，还未走出大门，就突然跌倒，与世长辞了。

现在伯韬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给予我的印象却难以磨灭。在已往四十多年的长远岁月中，他以始终坚持不懈的许多具体表现证明了一点，他确实是以董老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来做人、做工作的。革命立场坚定，对党忠诚老实，凡事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待人诚恳亲切，可以说早已成为他坚定不移的习性。如果用一九八〇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检查和衡量他的一生，我认为其中大部分主要之点，他在事实上都早已自觉地做到了。好些同志说他是我们党内外许多为党为人民、苦干实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模范战士之一，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在今天坚持四项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只有认真学习、并努力发扬光大他的这些可贵精神，才是我们对她最好、最切实的悼念。

一九八一年四月